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7

宋辽金元卷（下）

本卷作者
乔卫平

总主编
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

学术顾问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7

宋辽金元卷
(下)

本卷作者
乔卫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乔卫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中国教育通史/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总主编)

ISBN 978-7-303-15607-8

I. ①中… II. ①乔…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中国—宋辽金元时代 IV. ①G5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80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9014
北师大出版社教育科学分社网 <http://jyxx.bnup.com>
电子信箱 jiaoke@bnupg.com

ZHONGGUO JIAOYU TONGS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60 mm

印张: 33

字数: 473 千字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5.0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罗佩珍
美术编辑: 纪 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顾明远

总主编 王炳照 李国钧 阎国华

修订工作组组长 田正平

修订工作组成员 田正平 金林祥 俞启定 于述胜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述胜	马 镛	王建军	田正平	乔卫平
刘 虹	宋大川	吴宣德	苏渭昌	金林祥
郭齐家	俞启定	施克灿	顾明远	梅汝莉
雷克啸	熊贤君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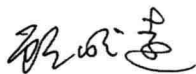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通史》即将付梓。首先我要向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以及参加这次修订编纂工作的学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辞辛苦，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完成这部巨著。

《中国教育通史》是将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 卷本）和王炳照、李国钧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 卷本）合编而成的。原来两部著作是三位教授的力作，本来由他们合作主持合编修订中国教育通史是最合适、最理想的，可惜李国钧、王炳照两位先生都先后离世，阎国华先生年事已高，于是由田正平负责的修订小组接手完成，原作者都基本上参加了此次修订工作。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都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多次合作过。我主编的《中国教育大系》中《历代教育论著选评》和《历代教育制度考》两大系列就是王炳照、李国钧两位编纂的。阎国华则参加了我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的工作。李国钧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的权威，不仅著作丰硕，而且培养了一批人才。阎国华先生是河北大学教育史教授，兼通中外教育史。王炳照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是我的同事，我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并且对教育史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是我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们师承舒新城、孟宪承、毛礼锐、陈景磐、沈灌群、滕大春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们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探寻中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是两部巨著，各有 300 多万字，把两本书合并起来，编纂成一部《中国教育通史》，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田正平、俞启定、金林祥、于述胜几位教授主持下，原作者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对两书的合并、调整、修订、创新，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最完整的中国教育通史。这部书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一是，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二是，标志着我国新一代教育史学家的成长，因为参加修订工作的大多是各校中青年学者。李国钧、王炳照、阎国华开展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承上启下的工作，现在后继有人，值得他们欣慰了。



2013 年 3 月 6 日

本卷导言

10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之后，再次出现了相对和平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又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于 1125 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 12 世纪初至 13 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其辖地大体相当于今宁夏全境及甘肃、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则先后在 1234 年和 1279 年灭金朝和南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辽阔的元朝。

在宋、辽、金、夏、元分治并峙时期，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局面也时复出现，并且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发展的势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及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的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盛唐时代，受

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一、宋代社会概况

960年建立的北宋政权，是在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分裂割据后建立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北宋建国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比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太宗朝以后，节度使完全成为一种荣誉性虚衔。在中央，设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步军司，合称“三衙”分领全国禁军。又设枢密使“佐天子执兵政”^①，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相互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

宋代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处于被周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敬慕的优越地位，但在军事上，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却无疑是一个弱国。而且由于常年与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边境战争，军费开支极为庞大，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加以冗官冗政的弊病，北宋在历史上便一向以积弱积贫而著称，国势日衰，虽经多次变法也未能挽回局面，最终被崛起于北方的金王朝所灭亡。到了南宋时期，“绍兴和议”换来的实际也只是“儿皇帝”的屈辱贱名。而且，南宋历朝皇帝多为平庸的君主，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不思进取，长期拘守偏安一隅的局面。

宋代的手工业经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基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

^①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笔谈》描述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主张以石油取代木材作为燃料，指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①除冶铁以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

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 160 多行，南宋临安则有 414 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到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治”局面。

宋代在科技、文化领域获得较为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和广泛应用的。其中，雕版印刷术在北宋中期以后的广泛应用，是促成宋代州县地方教育推广发展的直接动因之一。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而宋代高度发达的矿石开采业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则直接得益于火药技术的应用。

此外，在天文、数学、医学、农艺学、军事学、建筑学等领域中，宋代也取得了广泛的成就，这些都为宋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上述各个领域中的进步也直接得益于教育的发展。

^① 《梦溪笔谈》卷二四。

二、宋代教育概况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史上，宋代教育制度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所谓“承上”，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教育体制在唐代形成基本框架之后，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扩充。宋代的教育制度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所谓“启下”，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教育体制在宋代基本成熟定型之后，被其后的元、明、清诸朝所沿用承袭，没有再出现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因此，宋代的教育制度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国家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就其内容的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了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第二，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都大体成为定制，并为以后历朝所沿用。

第三，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基本完成了调整、改造和逐步健全的任务，进入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辨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学

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两宋时期的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两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才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州县官学尚未设立的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都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

两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不仅本人喜欢附庸风雅，吟诗赋画，并且确有几个皇帝在书法、绘画及诗文方面表现出特殊的才华，像徽宗在花鸟绘画方面，高宗在书法方面均有相当的造诣。尽管他们绝不是英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表现也极为平庸，但由于他们雅好文学艺术，自然会影响宗室及社会的风气，由此对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化教育方面，两宋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措施。例如，对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誊录、锁院、别头试等办法，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平竞争，消除了徇私舞弊现象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即使在地方州县官学尚未建立的太祖、太宗两朝，朝廷仍然通过不断扩大科举考试规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尚文贱武、尊孔崇儒、奖励文士等多种形式，鼓励人们读书仕进，特别是鼓励寒俊之士读书进取，因而营造出了一个普遍的尊师重教、读书为贵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推广的范围日益扩大，受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多。正是在这样一个广泛而浓

郁的人文背景下，一大批杰出的文人秀士方能够脱颖而出，使得宋代社会能以人才辈出、文运隆盛的美名昭灼于史册。

在教育思想方面，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主宰学术与教育领域的汉学，经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融合与演变，在两宋时期被称为宋学的新学术思潮所取代，从此进入所谓的宋学阶段。宋学提倡疑古惑经的学风，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的精华，抛弃了汉魏以来长期流行的象数、讖纬之学，并突破了天人关系的界限，用抽象思辨的方法，分析和探求宇宙、人类社会以及教育和哲学的广泛问题，从而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经济、哲学以及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虽然也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事件，但就总体而言，学术思想领域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深刻、严肃而认真的。

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宋学又逐步分化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仅理学一家，就有濂、洛、关、闽诸多学派，其他理学分支，如胡安国、胡宏父子的湖湘学派，张栻的南轩之学，陈亮的永康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的永嘉学派，以及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东莱之学等。这些学派均对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发挥着导向的作用，有些则首先体现了某个特定区域的学术传统和特色，又进而将影响扩展到全国范围之内。如胡氏父子的湖湘之学对于明清之际船山之学的影响，永嘉、永康之学浓厚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传统对于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影响，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明清启蒙学派的思想渊源。

在宋代的诸多学派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的功利主义教育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和阐发，经南宋朱熹等人所总结和发挥

的理学教育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这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北宋后期及南宋大部分时期文教政策的走向，对于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制度的演变，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程朱理学正是在南宋理宗朝开始站稳了脚跟，以后又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统地位。

三、辽代社会与教育

建立在北方的辽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封建割据政权。契丹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约在唐朝贞观(627~649年)年间，契丹大贺氏联盟归附唐朝，其首领得赐姓李。唐在契丹故地设置松漠都护府，契丹从此纳入华夏文化的系列之中。916年，契丹首领耶律亿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后，积极向南扩张，占领大量汉族土地，并俘获大批汉族人民。947年，辽世宗即位，改国号为辽。约在10世纪上半叶，契丹族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开始较多地采用汉族的文化及礼仪。

契丹在频繁征战的同时，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契丹人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处于全盛时期的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本人崇尚汉文化，喜读《贞观政要》，吟诗弄曲，鼓励汉族士儒参与辽政权的事务，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一些有助于振兴文教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官方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四、西夏社会与教育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国家。党项人是古代羌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于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约在公元6世纪末迁至今甘肃、宁夏地区。贞观年间，党项人归附唐朝，其首领接受唐皇赐姓李。

在历史上，党项人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很大影响。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后，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开始其逐步汉化的进程。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1036年)参照汉字的结构创制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书、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刻字司”，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这些图书的引进与刻行，无疑是促进西夏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积极步骤，也是西夏实施汉化政策、发展西夏与中原地区文化教育交流的一项内容。

西夏从景宗建国至崇宗、仁宗朝，汉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涌现出一大批对汉文化造诣很深的学者、文人，而且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接受了汉族文化的熏陶。流传至今的西夏文学艺术作品及宗教建筑遗物等，均保留着浓重的汉文化的痕迹，便是有力的证据。但由于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少量的有关教育概况的介绍也来源于零星的或间接的文献。这些散存于全国各地的有关西夏的文献主要是一些碑刻、题记之类的材料，其内容除宗教、历史、法律、历法等以外，也有一些劝世从善的诗体俗文。1908年，俄国人柯兹罗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盗掘一座西夏古墓，窃走大量有关西夏的文献，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夏的最完整的文献史料。这批文献约有405种，原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苏联解体后情况不明。

五、金代社会与教育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和西夏更为彻底。女真族

原名肃慎，是中国东北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民族。肃慎的后裔名称屡有变迁，到隋唐五代时称为靺鞨。约在7世纪末，女真族的粟末部人一度建立了渤海国，存世290年后，被辽所灭。1115年，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即皇帝位，起兵抗辽。此后不断向南扩张，并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对外打起“灭辽举宋”的旗号，对内开始参照汉法建立礼仪制度。

女真人在文化教育方面比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更有作为，不仅建立了比辽、西夏更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也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

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尽失女真之故态”，其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嗜习经史”“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①，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居天下之正”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浸忘旧风”，但他仍然极力推崇“唐、虞之圣”，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六、元代社会与教育

元王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创建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蒙古族是原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游牧部落民族，约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逐步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在漠北建立了大蒙古国。此后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动战争，其势力向西扩展到今俄罗斯及东欧地区，向西南扩展到西亚及印巴次大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上

^① 《北盟会编》卷一六六《金虏节要》。

述地区先后建立了奉元朝为宗主国的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的所谓“四大汗国”，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的帝国版图。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汗位，将燕京定为中都，蒙古人的统治重心逐步由北地南移到中原汉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升燕京为大都，不久灭南宋政权，统一了全中国。

元王朝建国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以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进而加强元王朝的统治基础。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人便任用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开始在蒙古族统治的区域试行汉法。忽必烈即位后，上层社会的主流已明确地认同了“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观念，开始全面地推行汉法。元朝的历代帝王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尊孔崇儒、提倡理学的政策，大力创办中央与地方儒学，发展经学教育，并广泛地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王朝的政权之中。虽然元朝在近百年的统治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广大汉族人民的歧视政策，其对于各民族人民的防范与压迫也未尝稍懈，但汉化政策的实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蒙汉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的文教政策及其措施/1

第一节 “右文”政策及其内容/1

- 一、尚文抑武，鼓励臣民读书修文/3
- 二、改革科举制度，扩大录取名额/5
- 三、大力振兴图书事业/8

第二节 尊孔崇儒与封建纲常秩序的重建/11

- 一、重建孔庙，整饬封建纲常秩序/11
- 二、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16
- 三、逐步强化儒家经学教育/23

第三节 程王之争与两宋文教政策的走向/24

- 一、程王之争的焦点及其性质/25
- 二、北宋末年与两宋之交的程王之争/26
- 三、南宋时期的程王之争/28

第二章 宋代的历次兴学/32

第一节 兴学之前的宋初教育状况/32

- 一、庆历兴学之前的中央官学/33
- 二、庆历兴学之前的州县官学/37
- 三、庆历兴学之前的其他教育类型/49

第二节 官学的振兴与改造/53

- 一、庆历兴学/54
- 二、熙宁、元丰兴学/59
- 三、崇宁兴学/65

第三节 南宋教育的主要变化/70

-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70